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八八期 ——
(二〇〇九年二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02a)

- 【国史论衡】“砸烂旧世界”的真实写照——读卜伟华《“砸烂旧世界”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余汝信·曾 鸣
【往事追忆】 红卫兵为什么产生在清华附中 索 达
【当事者言】 文革前的清华附中 阎阳生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国史论衡】

“砸烂旧世界”的真实写照
——读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 余汝信·曾 鸣 •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68年分卷（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以下简称为《“砸烂”》）由卜伟华执笔，多少算是找对了人。理由起码有二：其一，卜本人是红卫兵及红卫兵运动的始创者——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员，文革以后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且也是最早从事文革研究的学人。他发表过的文章表明，他对文革前期尤其是北京地区的红卫兵运动不仅了如指掌，同时对自己亲历的这场浩劫也有着深刻的反思；其二，卜是三年文革论的服膺者。他认为，“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三年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特殊时期，国内一般称为文革的第一阶段，其实，这三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1966年到1976年的这十年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例如：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都是在宣称进行文化大革命；右倾思潮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后七年基本上延续了前三年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毫无疑问，前三年和后七年也有许多重大的区别。例如：前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暴发式的，最为混乱、无序，而后七年的运动则基本上是在有序的框架内运行；前三年全国的党政领导体系基本上都经历了从被砸烂或瘫痪到重建的过程，而后七年党政领导体系始终都比较健全；前三年社会运行的基

本形态是群众运动，后七年则基本恢复到文革以前的一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模式”。（《“砸烂”》后记，页793—794）实际上，本书是基本上完成了客观地反映1966—1968三年间全国文革概貌这一并不轻松的任务的。

一、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

卜伟华在《“砸烂”》后记中论及而笔者又深有同感的是一一为尊者讳，是大陆文革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所谓“尊者”，既主要指毛泽东，又包括大陆党史上的“正面人物”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卜伟华称：“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他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有些人虽然也抽象地承认毛泽东应对文革负主要责任，但在论述中常常强调他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常把文革中的许多坏事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意无意地掩饰了毛泽东的主导作用。例如在文革中的外交问题上，许多著作都把林彪、江青，甚至王、关、戚，当成了文革时期外交上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而毛泽东则成为了纠正极左思潮的人物，这就根本颠倒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周恩来、陶铸、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在文革的进程中，他们在很多时候也是看不清形势，他们都曾努力紧跟毛泽东，也说过许多错话，干过许多错事，也整过许多好人。对文革造成的民族灾难，他们也应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砸烂”》后记，页794）

对于一位身在大陆且又是“体制内”的学者来说，能有这样突破文革研究领域中对尊者讳的思维定势的深刻认识，确为不易。笔者感觉到，在《“砸烂”》一书中，作者表面上往往“述而不作”，重叙述事件经过而不作或少作评论，惟叙述事件经过的字里行间本身，其实是倾注了作者的立场的，是力求不为尊者讳的。

如关于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砸烂”》的作者指出：“在一些比较权威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对于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开始时不同意，但后来被江青说服了。也就是说，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被动的。这一说法很可怀疑”。在引述了毛1967年2月3日与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谈话后作者又称：“毛的这个讲话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他是在明知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会遭到其他中央领导人反对的情况下批准组织这篇文章的。但他所说的‘开头写我也不知道’的话是不能当真的。江青已经说了，没有毛的允许，她是不敢动手的”。“在点名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这件事上，毛泽东是主动的，江青不过是毛的一个‘卒子’”。（《“砸烂”》页11—13）

又如在述及1966年3月批判罗瑞卿的京西宾馆会议时，作者指出，是“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主持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致信毛泽东：“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问题，4月8日已经结束小组会议，工作小组起草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征求了会议各同志的意见，没有采取会议通过的方式。现将这个报告和中央批语草稿送上，请你看看是否可以。我们已在会议上宣布，这个报告须经主席、常委和林彪同志审阅后定稿”。而到了4月24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人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砸烂”》页36—38）

即使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文革受害者，作者通过掌握的相关资料，阐明了文革开始时他们并非是消极的，而是想方设法要把这场运动按毛泽东的要求进行下去。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干部问题上，刘、邓也是上纲上线的。如作者在叙述1966年5月华北局会议批判乌兰夫以

后，写道：“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与乌兰夫谈话，严厉批评了乌兰夫，一是说他搞地方民族主义，二是说他不搞阶级斗争。邓小平说‘老党员乌兰夫变成了牧主、富牧的代表。’”“刘、邓还指责乌兰夫‘玩小名堂，耍手腕，搞两面派，积累那么一大堆问题，相当恶劣了。’”（《“砸烂”》页104）此外，刘少奇1966年5月2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判，并批评了陈云在1962年提出的包产到户的主张（《“砸烂”》页93），所有这些，使读者看到了文革初期刘、邓的另一面。

二、不让“坏人”代毛受过

此一命题与前一命题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官方文革史上的“坏人”，就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王关戚等等。为此，作者在《“砸烂”》后记中论及“为尊者讳”时又指出：“同样，对这一时期的江青、林彪、陈伯达等人，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夸大，不丑化，力求反映他们的本来面目。例如江青，她遇事易冲动，说起话来口无遮拦，常常信口开河。但细究起来，她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并不都是她个人的行为。毛泽东确实有许多批评、挖苦她的话，但不容否认，江青还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所最信任的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1967年8月4日的两封信就是明证。江青的一些言行，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从江青关于文革的种种议论中，从她攻击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的许多话语中，摸到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脉搏。又例如林彪，他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时所主要依靠的对象，但他在很多问题上与毛泽东并不一致，而且在他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的问题上，有些是林彪比毛泽东更正确一些，或者相对来说更有道理一些，例如在起草‘九大’报告问题上，在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砸烂”》后记，页794—795）如关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官方文革史往往根据此标题就把《纪要》定性为林彪与江青勾结的产物。《“砸烂”》的作者则敏锐地批评了此“定论”，称：“在谈到《纪要》时，许多人都称这是林、江勾结的结果，这几乎已经成为定论。实际上，当时江青的步入政坛，仅仅是刚开始，林彪虽然近年来声誉日隆，毛泽东‘接班人’的形象呼之欲出，但也还没有正式出山，说是他们勾结的结果，非常勉强。江青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还远未形成自己的势力。无视起决定作用的毛泽东的存在，只提江青、林彪，回避毛泽东，虽然出于一些人维护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但却是违反历史真实的，因而也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砸烂”》页52）

又如打倒陶铸，官方文革史一般指陈伯达、江青所为。《“砸烂”》的作者则持不同意见，指出：“江青等人未经毛泽东同意，就擅自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陶铸，此事令毛泽东大为不快，几次批评了江青、陈伯达。但毛泽东批评的主要是江青等人事先未向他报告，批评的是程序问题而不是实质问题。对陶铸，毛泽东是早就不满意了。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陶铸问题，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砸烂”》页365）

官方文革史往往将“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归咎于王力、关锋等人，《“砸烂”》则持不同意见，称：“所谓‘揪军内一小撮’，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略说法。现有许多论著将这一口号的提出归咎于1967年1月关锋等人所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是很不准确的”。在引述了王力关于此事的回忆后，作者又指出：“王力的这个说法值得注意：即这个宣传要点‘是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当时军委常委包括几位老帅在内，军委常委会议一般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主持，而林彪一般是不出席这样的会议的。如果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确实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那显然就不应说成是‘关锋、王力等四人’、‘江青等人’或‘林彪、江青等人’的责任”。“其

实，‘揪军内一小撮’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就是要揪党内、军内、政府内和各种文化界的‘一小撮’。这在《五一六通知》中就由毛泽东亲自明确宣布了。所谓‘军内一小撮’，就是‘党内一小撮’的组成部分。只要‘揪党内一小撮’是合理的，那就没有理由说‘揪军内一小撮’有什么问题”。（《“砸烂”》页535—536）

再如有关谁是1967年全国武斗升级、“武装左派”的始作俑者问题，大陆研究文革的著作大都异口同声地指江青为罪魁祸首。惟《“砸烂”》的作者指出：“7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时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毛泽东从上海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提出了武装左派的问题，二是提出了群众专政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此前林彪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在信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毛泽东在信中还说到：另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群众专政，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认为当务之急是‘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国内许多有关文革的著作中都强调指出：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时公开提倡‘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江青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力、号召力确实了得，但真正对全国局势造成根本性影响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的‘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两大口号对全国动乱局面的加剧所起到的巨大影响，现在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甚至还不太为人所知”。（《“砸烂”》页576—577）

以上所举例的数条议论，恰如《“砸烂”》整书的风格，行文简捷，要言不烦。议论在本书中所占篇幅甚少，惟寥寥数语，已直中要害。

三、大胆揭示文革的残酷性

作者在《“砸烂”》后记中论及过往大陆的文革研究存在的问题时，认为其中之一是对文革的残酷性反映得不够。作者称：“文革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人权——人的生命权、思想和言论的权利、个人的尊严、个人财产权，被践踏无遗。社会动荡，人民遭难，人性扭曲，出现了许多罕见的丑恶现象。在广西，出现了大规模的杀害人民群众和剖腹、挖心肝、吃人肉的现象。堪称文革中最为丑恶的典型事例。在所谓‘斗争哲学’的指导下，全社会混战一场，冤假错案遍于国中。据我估计，文革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当以百万计”。“我认为文革中这些最黑暗、最丑恶的部分，不应该被掩盖，应该作为深刻的教训留给后人”。（《“砸烂”》后记，页795）

作者认为，对文革的研究应重于定量分析和个案分析，而不要浮于泛泛而谈，对文革中具体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组织，要有认真细致的具体研究和分析。“如果没有对当时的事件、人物、组织的具体分析，那么一切宏观评论都会成为沙滩上的建筑，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例如讲文革中出现了夺枪事件，但如果不把在这一时期全国各个地区到底出现了多少起夺枪事件，总共夺了多少枪这些数字讲清楚，那么人们是不会对夺枪事件有什么深刻印象的。整个文革的历史，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人物、组织汇集而成的历史，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具体事件、人物、组织，这样的历史就成为空洞无物的说教了”。（《“砸烂”》后记，页795）

有鉴于此，虽受全书体例、篇幅所限，《“砸烂”》还是通过不少典型事例揭示了文革的残酷性。如北京市大兴县残杀“四类分子”事件，广西大规模残杀民众并剖腹、挖心肝、吃人肉的典型案例，湖南道县事件，内蒙古深挖“内人党”运动，云南“滇挺”事件等等。至于文革中受迫害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和数字，作者也多有披露：“一个云南赵健民特务假案，审查了138

万多人，其中立案审查17万多人，打死逼死17269人，打伤致残的61000多人。一个‘内人党’的错案就有34万多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砸烂”》后记，页795）。至于在“破四旧”、“红色恐怖”、夺权、二月镇反、武斗、清队、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运动中非正常死亡情况，作者也一一作了揭露。

本书第九章“波澜再起”中专门有一节述及“广西事件”。作者明确地指出了广西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央、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的决策错误：“1968年夏，广西派性斗争激烈，武斗不止，中央为解决广西问题，发布了‘七三’布告，并以此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要求各地制止武斗、推动大联合、三结合。但广西问题十分复杂，中央的果断决策过于草率，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七三’布告发布后，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支持‘联指’派武力镇压了‘四二二’派，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更为严重的是，以后又在广西各地‘刮十二级台风’，向各种所谓‘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死亡悲剧”。（《“砸烂”》页706—707）

如1968年7、8月间广西南宁镇压“四二二”的所谓战斗，“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的战斗共造成1490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四二二’据点中的人，各县民兵在进攻中被打死60人，参战的解放军被打死26人。被抓获的‘四二二’俘虏9845人，其中有7012名俘虏交各县领回，其中有2324人被打死。攻打解放路时，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20多间，建筑面积达46万平方米，使1万多户、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6000万元以上，群众私人财产损失无法统计”。（《“砸烂”》页718）

如“宾阳县在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中，全县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了人。从7月26日至8月6日的十一天里，全县被打死3681人（其中：国家干部51人，教师87人，工人27人，集体工75人，农民居民3441人，使176户全家灭绝），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亡人数总数3951人的93%”。（《“砸烂”》页722）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无数残酷的事实中，最突出的是广西境内发生了多吃人的野蛮事件。在历史上，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存在着奴隶及战俘被杀吃肉的现象，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精神文明、社会道德的发展，人吃人的野蛮行为早已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绝迹。然而，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中国，在广西却发生了数百起这种丧失人性、愚昧无知的人吃人惨剧”。“在广西发生吃人肉、挖人肝等野蛮事件的有武宣县、上思县、灵山县、天等县、贵县、横县、武鸣县、隆安县、都安县、大新县、浦北县、崇左县、容县、钦州县等县。仅在武宣县就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野蛮者吃掉。……其中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剖生割的7人。灵山县檀墟、新墟两公社就有剖腹食肝22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18例，浦北县北道公社定更大队有19例，钦州县小董茶场有3例”。（《“砸烂”》页724）

四、对史料准确的判读和利用

正如本书作者所论及的，对于文革研究者来说，最大困难在于史料的缺乏。虽然已事隔四十年，大陆对文革档案基本上还是处于未解密、不开放状态。

又正如王年一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及的，卜伟华多年来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二部（研究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部门）做研究工作，可以接触到中共中央的档案。（《“砸烂”》序言，页XXII）惟由于党的纪律的严格限制，他在本书中不仅不能使用，甚至不能提及这些档案材料。但是多年的接触、阅读，无疑可以帮助他对史料形成较为正确的认识和较为准确的辨别能

力。

由于上述原因，本书使用的，全部只能是公开的出版物。据作者自己所说，“本书的写作，尽量利用国内现有的各种资料，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下三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十三册）、《周恩来年谱》、《刘少奇年谱》、各种传记、回忆录等。文革期间各级组织编印了一些资料集，如1966至1968年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共七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到1969年间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共三集。只要下功夫去找，散落在民间的此类材料各地还有不少。至于各群众组织自行编印的形形色色的首长讲话集、中央文件集就更多了。尽管这些资料远非规范、可靠，而且不系统、不全面，但在现有条件下总还算给研究者提供了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党史研究室、史志办公室出版了许多有关党史、地方史的资料，如大事记、大事年表、地方志、部门志等，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材料”。（《“砸烂”》页797）

作者也援引了美国和香港等地出版的有关文革的书刊与光盘披露的资料，但他不盲从，不照搬照抄，而是经过细致的考证和研究来决定取舍。如作者谈及，“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了一张汇集文革资料的光盘——《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其中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在文革中的讲话，有文革期间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有红卫兵、群众运动的重要文献，以及文革时间异端思潮的重要文献等。这张光盘内容丰富，总字数达三千万。这张光盘远非完美。因为信息量太大，而参与光盘制作的人力有限，时间也短，错漏当然不少。我在仔细浏览过这张光盘后，感觉它编排还不够理想，材料有些不实，核对方面的问题较多，有些重要的资料没有收入，收入的资料中存在虚假或伪造的成分。例如其中有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中央支左部队进驻各大军区、省军区的若干指示》（1968年6月10日），经过考证，可以断定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尽管伪造的技巧相当出色，几可乱真。《文库》中第四部分是‘中央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指示’，其中有一件《戚本禹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代表的讲话》（1966年11月12日），明显应该是戚对首都‘二司’的讲话；另外有一件《关锋、戚本禹对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代表及师生的讲话》，标注的时间居然是‘1966年9月31日’，其编辑之仓促草率可见一斑。但总的来说，还是瑕不掩瑜，其大部分内容是比较可靠、准确的”。（《“砸烂”》页797—798）

据统计，《“砸烂”》全书共有注释1181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作者是力求做到言必有据，基本上做到对每一事件的叙述都说明了资料来源出处，而且这些资料作者都经过自己的查验认为是准确、可靠的（事实上绝大部分也如此，但不排除也有极个别走漏眼的）。作者在充分援引这些资料的时候，无意中为其他研究者及后来者提供了不少专题性研究的资料线索。如研究红卫兵运动，目前已经披露的资料有什么，其出处在什么地方；研究武斗已公开出版的书籍有哪些；研究夺权的资料有什么，如此等等。由于本书的篇幅关系，大部分事件只能述及简略经过，如其他研究者或后来者有意深入为之，本书其实已为他们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探索路向。

五、为本书挑的一些刺

以上所说，都是《“砸烂”》一书的长处。惟一部书，不可能十全十美。《“砸烂”》的长处是突出的，但按照惯例，末了，笔者也不得不为本书挑一些刺，以为评论全面些。以下数项，不一定对，提出来与作者商榷。

1、《“砸烂”》大体上是以政治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纵线相连贯成书。以一部国史的全面要求来衡量，《“砸烂”》似乎称之为国家政治史更为恰当。诚然，1966—1968年的中国是以政治

斗争为中心的，惟剧烈的政治斗争对国家经济、文化、外交、军事诸领域的重大影响，本书并未能分门别类地加以详细的描述及更为深入的探究。同样是作为中国断代史，著名的美国学者R·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编纂的《剑桥中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即有专章论及“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在谈到文革前期的四年时，作者以数据表明经济混乱的状况“只限于1967、1968和1969年三年。而工业和运输业也只是在1967和1968年才面临巨大的困难。到1969年，很多工业已达到并超过1966年的最高水平。而且，即使在混乱的年度中，工业产量与‘正常的’1965年相比，水平往往也没有下降得很厉害，何况还远远超过1962年萧条时期的数字”。《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将大跃进时期与文革时期的经济数据作了比较后称：“整个1958—1965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还不到1966—1978年的一半，而在前一时期的投资水平高出后一时期的一倍。简言之，大跃进是一场代价极高的灾难。而文化大革命在其高峰期（1967—1968年）的干扰虽是严重的，但基本上是短暂的，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时经过的”。“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追求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此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页501、507）事实是否如此？如是，原因又何在？我们在《“砸烂”》一书中未能得到答案。

2、本书在个别章节的个别事件叙述上仍存在着颇深的因循旧说的痕迹。如笔者所认为表现得最为严重的第一章第三节“批罗瑞卿”中“上海会议”一小节：1.作者称，“会议开得突然而又神秘。事前，除毛泽东、林彪外，其他的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被扩大进来的与会者，都不知道会议的内容”。（《“砸烂”》页28）作者该论断未免有些绝对化。据会议进行过程的实际情况分析，起码周恩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等人是事先知道会议目的的。2.作者引用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的“私下”谈话称：“定罗瑞卿总长为反党分子，我实在想不通，罗瑞卿会有什么问题呢？还不是林彪向毛主席告状，说罗总长有意夺他的权。”（《“砸烂”》页29）这与王尚荣本人在批罗中的表现并不相符。以后作为中央正式文件下发的王尚荣与杨成武、雷英夫在批罗时期的主要发言《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即为最好的证明。3.作者称：“上海会议后，罗瑞卿请求辞去军队内的一切职务及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共中央很快批准，并向县以上党委通报”。（《“砸烂”》页30）这是作者轻信了罗瑞卿本人回忆的说法，事实上并没有这么一个通报，因为罗的问题在上海会议后仅向部一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通报，此其时对部以下的干部还是严格保密的。4.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这一节中并没有说清楚，上海会议整个是毛泽东领导的，没有毛的首肯和主导，谁动得了罗这么个大人物？

3、本书著述严谨，惟全书篇幅浩繁，在个别史实上偶有小误，也在所难免。仅举三例：1.作者称，1966年5—7月间华北局即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华北局会议，“在前门饭店会议上，天津市委书记、市长胡昭衡和山西省委书记袁振也都受到了批判”。（《“砸烂”》页105）其实袁振在前门饭店期间的情况远比这么简短一句话复杂得多。事实上先是袁振在会议上散发材料揭发批判了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的其他负责人，这些负责人作了检讨后反过来对袁又作了反批判。2.作者在述及山西问题时称，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调刘格平、张日清回京，参加中央学习班，任命谢振华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主持山西工作”。（《“砸烂”》页783）作者所指，当为中发〔69〕42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关于解决山西问题具体措施的报告》，但该文件并未任命谢为核心小组组长和省革委会主任。周恩来在同年7月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谢振华“主持省核心小组和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谢直至1971年4月山西新省委成立前，一直是核心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和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4月，方被任命为省革委会主任。3.本书页484内称“山西人委参事室主任王学南”，其实姓名、职务均误。应为王定南，山西省人委参事室副主任。（2009年1月）

~~~~~

## 【往事追忆】

我对每一个当事人的最后一个问题都是——

红卫兵为什么产生在清华附中

• 索 达 •

当我们越过四十年的烟云回望文化大革命时，能留给历史的最鲜明的印记就是红卫兵运动了。在现代影视作品重现那段历史时，穿旧军装戴红袖章目光呆滞行为蛮横的红卫兵，已被定格为表现文革的典型镜头。

文革从红卫兵开始才成为蔓延全中国颠覆各阶层的群众风暴。它虽然昙花一现不到半年就被抛出政治舞台的中心，但红卫兵的名称却被对立的各派造反组织承接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在1968年官方取缔一切群众组织后，红卫兵却取代共青团成为法定的全国青年党团达十年之久。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它，红卫兵已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

但在已经出版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书林文海中，红卫兵只被当作被人利用的闹事学生而一笔带过，这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缺憾。文革史中最具特色的是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最具个性的是清华附中。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已注意到这一点：研究文革史不能不研究红卫兵运动，而研究红卫兵运动不能不研究它的创始人——清华附中红卫兵。

### ◇ 海外研究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但在这个研究中形成了两个鲜明的对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内地是禁区，在缺乏必要素材的海外成为热点。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的2006年更为强烈。而在海外或流传到海外的研究中，也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清华附中红卫兵是文革中打砸抢暴力的始作俑者，并定名为“清华附中暴力模式”。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者有海外学者郑义、王友琴和仲维光等。除王外，他们都是红卫兵的对立面或者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直接受害者。他们的观点在十年前即已成篇在海外确立，并通过网络传到内地，成为研究的主流。

作为直接受害者，对红卫兵暴力的有刻骨的记忆。作为移居海外独享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文革的批判已扩大到对整个制度和文化的思考，其中也包括对自己灵魂的拷问。但对国内改革发展的距离和俯视使他们有成为新精神贵族的倾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对文革的论点虽然难以在内地发表，但他们对红卫兵的描述却占据在大陆的影视媒体中。

二、清华附中红卫兵是文革中造反精神的倡导者，并成为群众民主运动的代表。

持这种观点的有张承志、骆小海、卜伟华、熊刚、宋柏林等。他们基本是当年创立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核心成员。除张外，他们的观点实际还没有成型并且成文很晚，只是最近由骆小海作序的《宋柏林红卫兵日记》在香港出版，但已引起关注。



作为红卫兵的创立者，对文革的经历不自觉呈现“记忆的选择性”。在每隔十年的回忆中，辩解多于反思。《宋柏林日记》作为原生态的记录有可贵的研究价值，而骆小海的序里对红卫兵的回顾虽然真诚，但在思考上还停留在那个时代。他们的观点虽然也不能突破内地研究的禁区，但在逐渐进入到权力层的前高干子弟中引起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清华附中作家群中两极的顶尖人物，蜚声海外甚至要提名诺贝尔的郑义已深入到拷问灵魂，被誉为大陆作家半壁河山的张承志已上升到追思宗教。而看透人生彼岸的史铁生则是淡淡地一句“我当时尚智性未开”，却让你感慨不已……。

与此相对的还有一种大众的观点，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其他红卫兵一样，是一群被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利用的高干子弟，也是受极左路线蒙蔽的受害者。其实这很难被称为有立论的观点，而只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但它却被广泛接受，成为受害者表示对以往宽容和红卫兵推卸历史责任的最省力的麻醉剂。

#### ◇ 清华附中红卫兵 200 天

作为红卫兵的创始者，清华附中红卫兵已成为一个专用历史名词。但它从 1966 年 5 月 29 日圆明园定名公开亮相，在 8 月 18 日毛泽东天安门接见达到高峰，于 12 月 26 日北展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退出历史舞台，其勃发的生命期也只有 200 天。

但也就是这 200 天红卫兵席卷全国震惊中外，同时这 200 天也代表了独立意义上红卫兵的兴衰。所以我们把目光从历史广袤的时空浓缩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 200 天，既有特殊的典型意义，又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精神是贯穿它行为的一条线索。如果把它不同时期造反的对象罗列出来，正好也体现了它发展兴衰的四个阶段：

##### 一、1966 年 5 月中——6 月中：对抗学校领导为代表的教育路线。（创立期）

[典型事件] 熊类事件和派系雏形、红缨小组、预 651 观点、大批判中的两派雏形、5.29 成立红卫兵、6.3 第一张大字报、6.6 外校声援。

[代表文章] 红卫兵反校领导的大字报。[对立文章：宣战“致……干部子弟们”]

##### 二、1966 年 6 月中——8 月中：对抗工作组为代表的传统体制。（发展期）

[典型事件] 6.8 工作组进校、批斗校领导大会、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卫兵和工作组分裂、7.26 中央文革江青接见、7.29 人民大会堂毛刘分歧、8.1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高一女生杨爱仑卧轨、

[典型文章] 三论造反精神万岁，毛给红卫兵信。[对立文章：]

##### 三、1966 年 8 月中——10 月中：对抗党政机构为代表的社会秩序。（颠峰期）

[典型事件] 8.18 天安门毛主席接见、大串联红卫兵蔓延全国、血统论和破四旧、校园暴力和物理老师刘树华自杀、王任重和红卫兵的接触和失势、

[典型文章] 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对目前形式的十点估计。[对立文章：你们屁股坐到哪里去了？]

四、1966年10月中——12月底：对抗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激进体制。（衰败期）

[典型事件] 对立造反派的兴起、重心转入大学、中央文革到清华附中支持4.3派、两派武斗升级、老干部受冲击、12.26联动大会、冲击公安部和拘押老兵、

[典型文章] 问罪中央文革、评出身论。[对立文章：出身论]

对于红卫兵的200天笔者还有专门的调研和论述，这里只是一个正题的参阅背景。

◇ 清华附中：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把红卫兵简单说成是一群在历史大潮中被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利用的高干子弟，无法解释红卫兵为什么恰恰产生在清华附中而不是高干子弟更集中的城里中学。所以研究清华附中和其他中学的异同是一个切入点。

天时：学生造反为领袖实施政治大手术找到了把手

1966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好转，党内郁积的政治矛盾终于浮出水面。在三年天灾人祸后退居幕后的毛泽东，用自上而下派工作组四清的传统做法已无法动摇刘少奇、邓小平的实际运行体系。

研究文革的学者章立凡认为：当时社会蓄积了很多矛盾，它需要有一种方式释放这种能量。而且对高层来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但苦于无法揭开这些矛盾通过某种方式把这种能量释放出来。清华附中红卫兵极富煽动力的三论“造反精神万岁”正在这时逆流而上生逢其时。本来是上层的矛盾，但是被由下而上的发动了。此乃天时。

应当承认历史有它的偶然性。但非清华附中不可能写出造反精神这样的文章并已以同样另类的方法送到毛泽东手中。是独特的地理背景和人文特点造成了这种偶然性。

地利：清华、圆明两园环拱滋养竞争精神阶级意识

地处清华园和圆明园之间的清华附中，深受清华大学美国式的竞争精神个人主义的熏陶和义和团式的民族沧桑阶级使命的笼罩。这两种既相悖又混杂的影响使清华附中占尽独特的地利。

十九世纪末由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的自由气质和个人主义对清华附中的影响外，他们之间隶属关系从体制上决定了它的独特性。和北京市的其它中学统归北京市教育局管理不同，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

而一步之隔的圆明园给每一个清华附中人的印记都是终身难去的。那是学校进行阶级教育劳动锻炼的基地，也是学生进行早读和秘密串联的据点。干部子弟的血统论和民国后代的原罪感都在残碑断柱间找到了孳生的土壤。

人和：独树一帜的精英教育和大学院所出身背景

预科的创办在北京是空前绝后的。直接由大学讲师任教的更使它在教材和目标上独立于其它中学。这使清华附中提倡个人竞争的精英选拔有了直接体现。

和城里党政机关密集，重点中学有中央背景的高干子弟集中不同。清华附中地处清华北大等八大学院和高等军事院校环绕之中，它的学生包括干部子弟大都来源具有知识背景的家庭。

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和具有知识背景的中层干部子弟是其核心。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是中产阶级知识出身的两派的共性。

#### ◇ 清华园：突出个人竞争的精英教育

1966年的清华附中正处在它的颠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预科的创立和夺得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四个组别中的三项冠军。

#### 清华附中由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顶级中学

和北京市的其它中学统归北京市教育局管理不同，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这就使由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和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共同倡导的，从小中大学一条龙的十年规划得以实施。这个打破常规旨在迅速培养一流人才的三级跳计划在北京是空前也是绝后的。

当时高三学生郑光召回忆到：“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雄心勃勃，要把学校办成全国中等教育的典范。学校自行的教育改革，除了受当时越来越紧张的政治气氛影响强化了政治教育之外，在扩大知识面（比如每周一节电影课，放映科技及外语片，鼓励各种课外小组及讲座）、讲究教学方法（强调少而精，反对满堂灌）、减轻学生负担（反对课外加班学习）、重视加强学生体质（强调田径运动以提高基本体能，甚至连下乡劳动，也把增加体重当成重要指标）等方面，都有一些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努力。清华附中激烈地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甚至明确提出仅学习成绩好不算好学生。从全国形势来看，我在清华附中的几年，恰好又是大饥荒之后文革之前最为宽松的时期。”

#### 预科的创立是竞争教育空前绝后的经典

从1964年开始在高一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建立两个预科班。预科的教材由大学编写、主课全由清华大学讲师任教。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只是选择什么重点科系的问题了。当时，清华附中已成为北京市收分最高的中学，学生的分班和学号都是按考分排列的，学号名列前茅的学生具有无可争议的心理优势。据当时的韩家鳌副校长介绍，选拔的标准德智体全面素质并注重学生的发展潜力。但考试成绩无疑是最硬的指标，预科的选拔使原本已成为学生信条的个人竞争更激烈了。

#### “学习以外语为纲”“体育以田径为纲”

六十年代主管教学的吴裕良副校长回忆了当时颇具清华附中特色的两条方针：“学习以外语为纲”“体育以田径为纲”。外语以不分年级班次的每分钟阅读多少印刷符号的统一标准，利于自由发挥便于动态比较，一时课外读外语成风。体育发出“把学生赶上跑道”的口号。每到下午四点半，校长带着各班班主任一个一个地教室搜查，操场上人生沸腾。

#### 精英教育和偶像崇拜

每分钟阅读上千外文字符的尖子和在运动会上夺冠的选手在这里享受英雄般的崇拜。而其中的佼佼者多为具有良好教育和家境背景的资产阶级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高三预科的陈小悦是清华子弟中的哈佛子弟，1米85的个头修长的双腿，外语考试已经无法对他评分，平时只看原著，在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连续两次夺得跳高冠军。卓尔不群的学习能力和出类拔萃的体育成绩使偶像产生。在走廊上低年级学生让开距离追随其后，在操场上人们远远地欣赏他做准备活动和练习过杆。

65年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还仿效大型历史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编自演了《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轰动一时。肌肉发达的百米和铅球冠军郑光召出身资产阶级，当时是这一剧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这种偶像崇拜的力量和政治化标兵不同，他的感染力无处不在，激发着每一个人的竞争出头的欲望。旅德学者仲维光写到：在清华附中，要想出人头地，只是一般的功课好是不行的，还必须有突出的体育成绩或文艺特长。这对干部子弟无疑是设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增加了这个学校的平民特色。“老师和校方天然地喜欢好学生并对那些娇纵散漫的干部子弟敬而远之”（郑光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创始人们大多是些干部子弟，他们文体平平但又不甘人后自视甚高，便在政治上表现自己。

#### 干部子弟标新立异和两个对立圈子

后来红卫兵《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骆小海，实际上是早在1965年就把提倡造反的文字贴在教室墙报上，只是大气候未到没有引起注意罢了。这种激扬文字高谈阔论的圈子也确实让周围同学感到神秘和羡慕。后来成为文革后第一代明星的霍秀儿，当时是出身于两航起义人员的初二美少女。她用了一个词形容对这些干部子弟是：“仰视”。实际上，以建国后的干部子弟和解放前的富贵后代为核心，形成了两个相互蔑视的圈子。

但在清华附中这种自由竞争的氛围中，学习和体育毕竟是硬件。于是这些干部子弟标新立异独出蹊径。高二的邝桃生、杨盘、阎阳生、张承志组织了“红缨”小组，准备跳级参加高考，并为此除了一种既有难题解析又有时事辩论的手写小报。这也后来成为后来红卫兵班际串联的雏形。

后来成为红卫兵主要组织者的高三学生张晓宾，为磨练意志组织了一个摔跤队，到比邻的体育学院向专业教练学习摔跤和格斗。这包括张承志、高洪旭、阎阳生等。有人怀疑，日后的暴力和武斗的潜意识或许在这里已经萌芽。

####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个人色彩：引导潮流之前又置身主流之外

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现的标新立异和强烈的个人色彩无不渊源于此，和城里中学红卫兵组织有序的团队精神形成鲜明的反差。从历史镜头和照片资料中可以看到，当各校红卫兵整齐划一地穿上绿军装戴上红袖章时，作为创始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依然是打着补丁的学生装束各不相同，以致发生被扎着皮带的红卫兵当成冒牌货扣起来的冲突。

在“八·一八”各校红卫兵在天安门上列队等待毛泽东接见时，惟独清华附中的各自为战四处乱串，骆小海等三个人竟跑到休息室毛泽东面前问为什么还没有收到信。

清华附中红卫兵这种卓尔不群的个性，使它在文革中引导潮流之前又置身主流之外。先对抗娇纵了他们的校领导，再对抗支持他们的工作组，三对抗利用他们的中央文革。

#### ◇ 圆明园：偏袒高干子弟的阶级路线

每一个清华附中人终身相随的幽灵

对每一个清华附中人来说，圆明园都是一个终身相随的幽灵。后来成为著名影评家的方位

津认为，圆明园已是两派共同的胎记。阎阳生有一段生动的描写：“那时的圆明园遗迹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无边的稻田和落叶当中，在夕阳中把历史浓缩成一片沉重的墓碑，压给我们一种近乎悲壮的使命感。尽管在晨雾中碰上早读的女生已使我怦然心动，但我会用一桶冷水浴压抑住自己的欲望。”

### 民族屈辱的废墟和阶级仇恨的课堂

清华附中校领导为摆脱出身的阴影，把民族屈辱的废墟变成阶级仇恨的课堂。在这里的忆苦思甜、插秧种稻、反思原罪、入团宣誓，都具有了一种图腾膜拜的仪式感，这是其他中学所不可能有的。被现在视为花样年华的男女学生，没有在圆明园这座“后花园”里初恋约会，而成了密谋造反的据点。这种使命感和激进性让人联想到一个世纪前俄罗斯贵族子弟的十二月党人。

###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干部子弟学习小组”

从1964年开始，迎合日益左倾的政治气候，学校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把干部子女单独组织起来传达文件，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姨侄女王海容的两次谈话就是这样传达的。附中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军训活动，其中干部子女的比例较高。这些都为新生之气又增添了浓厚的革命色彩。（骆小海）”

射击队在圆明园苍凉的田埂上立起了练习靶，使这些干部子弟亲身体会到父辈掌握“枪杆子”的感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被红卫兵迫害自杀的物理老师刘树华就是这些军训队的领队。在这些以出身作为选择标准的队组中，正如毛主席教导毛远新的：“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但由于圆明园独特的历史环境，无疑给这些干部子弟一种和血统意识混同的革命召唤。

### 红卫兵的圣地和受辱者的荒原

骆小海甚至认为“红卫兵在形成的过程中，圆明园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许多思想交流，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包括成立组织的那次会议。圆明园也就自然成了红卫兵的圣地，它曾让我一度感觉到，红卫兵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直接继承者。”

才貌出众的高一女生杨爱仑回忆：“那时忆苦思甜，历史老师带我们去圆明园，到废墟上讲八国联军烧……，我在圆明园写的那篇作业，被历史老师视为珍宝。”而正是她在受尽屈辱卧轨求死前就是跳窗跑到圆明园树丛里，她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象阶级教育中的白毛女一样逃到深山……。

### “熊类事件”和两派对抗

如果说清华园的个人竞争教育使学生中的高知子弟和干部子弟开始分化，那么圆明园的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却人为地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加深了两个圈子的对立。这由于一次偶然的校园“熊类”争斗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一时两派的大字报针锋相对。资产阶级出身的郑光召成了反对校领导偏袒干部子弟熊刚的领袖。其实，作为被打一方的熊刚虽然出身外交名门但并没有享受到特权。连郑光召也承认“熊刚学习甚佳，”但由于没有全面发展，被“视为‘白专’典型而没有选入预科。”这和他们认定的预科选拔主要靠出身有些自相矛盾，看来“记忆的选择性”人所难免。

### 怨恨种子和心理阴影

但这个事件却为文革中的两派对立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但这更给熊刚留下了屈辱的阴影。据郑光召回忆：“在同学们的舆论压力下，熊刚本人也写了大字报，承认自己出口伤人不对，向娄琦致歉。”而不少干部子弟认为熊刚太窝囊，“应当还手。”心理学家在分析红卫兵的校园暴力时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 出身鸿沟和校园暴力

王友琴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贡献给文革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卫兵”的名称，还有这样一套暴力迫害的模式。”骆小海等红卫兵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坚决反对暴力和武斗的，有1966年8月《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为证。对此，对立面尽管嘲讽但也不否认，“当然，这个模式中的一些构件，不一定是清华附中最先发明的。（王友琴）”“实事求是地说，我还是要感谢清华附中老红卫兵高度的政策性：由于有纠察队看管，打得很有节制，一见超出了展览的目的，便会加以制止。否则，让那些想赎罪或想练手的抡圆了打，还得再死几个。（郑光召）”

### 观点只是派性暴力的外衣

实际上后来的两派对抗并不总是以观点区分左右的，64年反对学校领导阶级路线的一派，在66年红卫兵反对校领导时却成了坚定的“保皇派”。这种“以人划线”真是“古已有之”。当红卫兵核心在工作组主持下当选革委会走上台时，底下的往日学校精英们觉得他们才貌平庸却飞扬跋扈，心中下定复辟决心。郑光召在反思各派轮流掌权的这一段历史时，认为对学校领导的批斗成了各派表现自己革命性的暴力竞赛。

### 清华附中红卫兵应有勇气承担“暴力模式”的历史责任

可惜的是在四十年后，尽管当年的红卫兵头头都承认清华附中红卫兵作为组织的暴力行为，但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打人，而是不断强调自己制止暴力的努力。倒是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政委宋柏林出版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心态：

1966年7月26日 星期五 阴

“……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不过我还从来没打过人，还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恨的不深，就是对人民爱的不深。你现在可怜他，他杀你时不可怜你。要敢于斗争，勇于树敌。”

清华附中除贡献了“红卫兵”的名称外，作为创始人他还以《三论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路线万岁》等风靡全国的文章贡献了红卫兵的理论基础。尽管他也反对暴力并在后来也成为文革暴力的受害者，但一系列的暴力行为正是通过红卫兵创始人的声望和示范效应而传播的。历史只注重事件，而性格是文学的事，这就是《法国革命史》和雨果《九三年》的区别。从这一点出发，红卫兵应有勇气承担“清华附中暴力模式”的历史责任。

### ◇ 四十年后：人才济济、鸿沟依旧

### 两派精英同为清华园、圆明园养育

清华园和圆明园养育了整个清华附中，红卫兵只是天时所赋予的一个胎儿。与城里中学的整

齐划一等级分明相对，清华附中标新立异无视权威。治世独创精神和竞争意识，乱世离经叛道和造反精神。清华附中红卫兵这种卓尔不群的个性，使它在文革中引导潮流之前又置身潮流之外。先对抗矫纵了他们的校领导，再对抗支持他们的工作组，三对抗利用他们的中央文革。

作为对立面的造反派也是个性鲜明宁折不弯。甚至在各校屈服于“红八月恐怖”时，出现了像章穿肉、卧轨抗争的惨烈事件。实际上作为红卫兵对立面的“4.3派井冈山”也产生在清华附中。

性格决定命运：官场碰壁和文人辈出

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在乱世时战场如鱼得水，在治世时官场四处碰壁。多出独立思维的作家学者，而鲜有依附人脉的高官巨贾。让我们随便数一下这些人物吧：王铭、景晓东、史铁生、郑光召、卜大华、刘刚、章立凡、张承志、陈小悦、骆小海、杨爱仑、甘铁生、邝桃生、霍秀儿、陶正、方位津、戴衔远、卜伟华、戴建中、宋柏林……。

四十年后两派分野鸿沟依旧

在文革前即已形成的以阶级出身划分的人际圈子，在红卫兵时期发展成两军对阵的派别，而在跨世纪的四十年后鸿沟依然存在。在2005年的清华附中九十周年校庆上，陈小悦等当年精英教育的尖子和韩家鳌等历任校领导们坐在贵宾席上，而王铭、张小宾、卜大华等当年红卫兵的头头均没有到场。在各班的聚会中，虽然大家尽量不去触及往事，当年炙手可热的红卫兵也被冷落在圈子的边缘。

而在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圈子里，在红卫兵成立四十周年时重返清华附中聚会。其在成分上的狭隘和感情上的怀旧仿佛仍停留在四十年前。而在校园崭新的实验楼和喷水的绿草坪里，家长在咨询择校，学生在冲刺高考，没有人注意这些衣着过时的长辈们在激动地争论什么……。

命运轮回：造反派谈宗教，红卫兵侃股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四十年前出身低微的平民子弟现在聚会时辩哲学谈宗教越来越象前世的贵族沙龙，而那时的高干子弟红卫兵现如今聚在一起却是下围棋侃股票一派平民色彩。青年拼死相争，老来命运轮回。

即使在欧美这样的个人主义氛围中，同是移居国外或拿到绿卡的老三届中，依然分成两个互不往来的圈子里。但一触及文革，在网上的唇枪舌剑依然火气十足。这反映在对文革的研究领域也必然形成相互隔绝，这不能不是我们这一代的悲哀。

2006年5月28——29日  
红卫兵成立四十年时写于北京清华园畔

（作者简介）索达：历经工农兵学商的“老三届”，环境科学高级工程师、管理学教授。

~~~~~

【当事者言】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地处西郊一隅的清华附中何以成为学运中心？为什么理工为上的清华附中却出现了一个影响一代人的作家群……

文革前的清华附中

• 阎阳生 •

1964年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好转，党内郁积的政治矛盾终于浮出水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而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而此时，在北京偏远西郊的清华附中却在独自进行着一场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1966年雄心勃勃的校长万邦儒正在把清华附中推向巅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北京空前绝后的两届预科的创立和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的四个组别中夺得三项冠军。

本文的研究谨以对不同当事者上百人次的采访为基础，力图为史学界提供一个清华附中“文革”前的客观背景和本底资料。

◇ 清华园、圆明园：两园环拱的独特环境

干部子弟骆小海认为，在历次运动中“圆明园都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许多思想交流，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包括成立组织的那次会议。”

后来成为著名影评家的方位津认为，圆明园已是两派共同的胎记。干部子弟的血统论和民国后代的原罪感都在这残碑断柱间找到了孳生的土壤。

两园环拱的清华附中在生源上也别具特色。作为子弟学校的延续，清华教授讲师后代中的佼佼者首选清华附中。清华附中地处清华北大等八大学院和高等军事院校环绕之中，它的学生大都来源具有知识背景的家庭。良好家境和西式教育使他们成为学校的主流。

即使作为另一主要成分的干部子弟，也和城里党政机关密集，重点中学有中央背景的高干子弟集中不同。来自军事院校和科研单位具有知识背景的中层干部子弟是其核心。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是知识中产阶级的共性。同样自负而奋发的高知子弟和高干子弟相伴相克，在一个突兀的时空交错点上终将撞出特异的火光。

◇ 大学直管：清华一条龙试验模式

和北京市的其他中学统归北京市教育局管理不同，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创立和直接领导的，校长和领导班子直接由大学调任。清华附中的前身清华大学志成学校创办于1915年，是清华大学直办的子弟学校。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曾在此就学接受启蒙。最早的校长有马约翰博士，校董有叶企荪、朱自清、冯友兰等。1946年设立初中，校长由清华委派，曾任校长的孔祥瑛（钱伟长夫人）和韩家鳌直至“文革”仍在校。

1960年高中的设立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清华大学抽调万邦儒和吴裕良、顾涵芬等一批青年骨干组成了新一届校领导班子。新任校长万邦儒雄心勃勃，一亮相便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改革规划，要把学校办成全国中等教育的典范。这就使由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倡导的，旨在迅速培养一流人才的从小中大学“一条龙”“三级跳”的十年规划得以迅速实施。

1960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对清华附中的改革起了关键作用。时任清华附中书记的韩家鳌回忆：“蒋南翔高屋建瓴，他们就是搞一条龙，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在中学就

要英语过关，到了大学不要拖后腿。这些思想，站得高看得远了。”

当时从清华调任附中主管政治的冯玉中回忆：“蒋南翔就觉得办好大学，要早从中学着手。清华附中的领导班子都是从大学来的，改革视角和其他中学不一样。北京市的一般的中学，它是从下往上看，就是升学，看的是有多少人能上大学。我们1960年的办学思想是什么呢？蒋南翔、何东昌、艾知生和万邦儒我们附中那几个主要领导，是从大学问起，是从上往下看，就是大学需要什么样的学生，我们就从中学起开始早培养。

从清华来看，比如外语，当时进来大学要学两年基础外语。蒋南翔他就提出，清华附中毕业生的外语能不能达到大学的二年级水平，用现在的术语也就是四级。”

六十年代主管教学的吴裕良副校长回忆了当时颇具清华附中特色的两条方针：“学习以外语为纲”“体育以田径为纲”。外语以不分年级班次以每分钟阅读多少印刷符号为统一标准，没有上限利于自由发挥便于动态比较，一时课外读外语成风。“像当时陈小悦就参加了大学二年级的考试，成绩优异。而且是一大批人都通过了，证明外语学得越早越好。（冯玉中）”

韩家鳌认为，清华附中改革和其它中学的另一个不同点是重视能力培养。“那时清华大学有一个什么问题啊，那就是普遍考进来分很高。但一到清华就是不及格，他们是高分低能。（冯玉中）”

附中的改革以清华需求为标准，在科目突出外语和数理化，让文科成为数理化间的休闲。举办各种课外班和竞赛，变被动应试为主动学习。比如当时陈志明老师教学法反对盲目大量做题，要求数学题不超过100道，提倡多种解法举一反三，鼓励创造性。对于竞赛成绩突出者给予重奖，比如当时难见到的外语大字典和将全校嘉奖记入档案。

学校出现了奋发竞争良性循环的生气勃勃的局面。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标兵，如品学兼优的刘延东，文武双全的关天池。对不按教学大纲的出格学生也给予宽容，比如高二的邝桃生等要求跳级考大学，初中的卜伟华要求不上数学课，自己钻图书馆自学，校领导也同意试一试。

1963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就一炮打响。“所以我们1960年办，1963年我们就赶上了。63年第一批毕业生考大学，那升学率是绝对的高啊。三年一检嘛，我们的学生达到了北京的先进标准。德智体都赶上了（城里）那些老牌中学。北京有很多老学校，象西城的四中，八中，二中，崇文的二十六中，解放前就有了，我们还是赶上了。

那时高中统一招生，全北京都可以报。清华附中收分当然高了，是全北京最高的之一。各校招生在一个大屋里，在女三中，档案都是一堆一堆放那儿的。第一志愿都是先填清华附中的，让我们先看。我们不要的，才给别的学校。我们招生的时候，分数里面还主要看外语，数学和理化。不是按着原来的分数排队，我们按着看三门课的分数重新排队。（冯玉中）”

我在1964年报考高中的志愿或许是一个佐证。我的报考顺序是：清华附中、101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现在炙手可热的首都大院附中那时还排不上号。清华附中和男四中、师大女附中三足鼎立难分伯仲，但外语和数学要求满分。而依托清华、设备齐全、地域开阔、气氛自由，更是城里学校难以比拟的。

1964年，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的清华附中经过三年的锐意改革后，开始走向他的巅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预科的创立和夺得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四个组别中的三项冠军。

◇ 预科选拔：空前绝后的精英教育

清华附中预科的创办在北京是空前绝后的。它使清华围绕大学办附中的宗旨制度化，使清华附中提倡个人竞争的精英选拔有了直接体现。

从1964年开始在高一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建立两个预科班。预科的教材由大学编写、主课全由清华大学讲师任教。进一步使它在教材和学制上独立于其它中学。“那时中学没有大学老师到中学去兼课的，我们是唯一。教物理那个张老师现在还在，也是第一个用双语教学的。（冯玉中）”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只是选择什么重点科系的问题了。清华附中预科实际上就是清华大学预科。

当时，清华附中已成为北京市收分最高的中学，学生的分班和学号都是按考分排列的，学号名列前茅的学生具有无可争议的心理优势。据当时的韩家鳌副校长介绍，选拔的标准德智体全面素质并注重学生的发展潜力。但考试成绩无疑是最硬的指标，比如我1964年考入高中是9号，1965年选入预科是33号，和预科选拔的比例大致相仿。预科的创立是竞争教育空前绝后的经典。预科的选拔使原本已成为学生信条的个人竞争更激烈了。

除教材不同外，预科的一大特点是减负担提高质量。我的班主任周鸿钧回忆当时的方针叫“少精高长”：即课时少、作业精、质量高、假期长。“一般的高中生每周上课是31课时，每天是6课时。但是预科的是每周24课时，每天上午上课，下午不上课。课时这么少，但学习还那么好，你说是怎么回事？少而精啊！比如有一个教几何的老师，李卫汉（音），别人要一百多课时才能教好，他说，我只要了三十几个课时。还有一个代数老师程向明（音），别人一个学期要做四十几道题，他只做了十几道，就能检查到各方面。（冯玉中）”

预科的另一特点就是重视动手能力。“物理化学，我们单独开实验课。比如说一般的班物理化学一学期要做二次实验，我们就做20次。每班分两个组，按大学的要求打基础，我们两个人一个小组做实验。（冯玉中）”

比较现在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实际仍以升学率为最高标准的素质教育，45年前清华附中这种以大学需求为宗旨的“少做题，多实验”，不仅是超前的也是具体的。

海外学者有一种说法是预科的选拔决定于学生家庭出身。笔者求证于主管教学的吴裕良副校长，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但在我学号之前的好几位同学，比如1号田维煦（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没有选入预科。冯玉中主任透露了一个潜规则，就是“选拔预科有一条，不能进清华大学保密专业的肯定不要。因为大学保密专业有政审啊，比如无线专业、高能物理专业。虽没说要求出身，但要审查。比如有海外关系的，家里是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的，有“杀、关、管”的，那肯定不要。说个典型的例子，那个教物理的那个张三会（音）老师。哦，他物理教得多好，他的孩子就没有进预科。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志成中学就被打成右派了。咱们的硬标准就是这个。因为1966年，那预科就是直接要升清华大学的。”

但出身限制绝不是主要标准，甚至“并不是完全看分数的，还要看你的学习能力。比如你分数高，但是你是死读书，而另一个人轻轻松松的有方法，就要他。我们不是光学理论，是要提高社会实践能力，思维能力，辩论能力，课堂讨论能力。（冯玉中）”

所以，在预科聚集的是一批成绩好、能力强、出身按当时标准又不太差的精英，他们大部分是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和有知识背景的干部子弟。它的目标简单明确：百分之百的上清华大学和其他重点大学。但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检验，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清华附中

预科的这场空前绝后的试验也在历史的烟云中被遗忘了。

◇ 体育崇拜：全面发展的竞争精神

清华附中留给我们的另一份遗产是她的体育精神。在这里死钻学习的书呆子受到蔑视，而体育夺冠受到崇拜。当时学校有条雷打不动的死规定：“下午4点，把学生赶出教室。”每到这个时刻，学生会放下所有的功课拥向操场，老师会一个挨一个地巡查教室。操场上各个运动队按部就班地训练，最体弱的眼镜们也要完成距离从北京到河内的“抗美援朝”冬季长跑。当时就提出了“体育以田径为纲，田径以速度为纲”的口号。

每天上午的课间操，教室里空无一人。上千的学生整齐地排列在大操场上，圆明园稻田和清华园草坪的气息伴着高音喇叭扑面而来。全体校领导都在二楼大平台上和大家一起做操，带操的往往是富有鼓动性的运动队长，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嗓门的李春生。接着是校长简短提示。与深色正装络腮胡刮得铁青的校长相比，不到30岁的团委书记顾涵芬浅色短袖白色发带，一口上海普通话讲得飞快，正是春风得意马蹄轻扬之时。

如果说课间操是例行检视，那每年春秋的运动会就是盛大节日。作为主席台的教学楼大平台有20米宽，正面是描绘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汉白玉浮雕。居高临下，面对400米正规跑道的大操场，运动会时红旗招展欢声雷动，颇有点小天安门的气派。

这时身为体育泰斗和附中老校长的马约翰教授会出席。年过八旬的马老扎着黑蝴蝶结白发飘逸，羊皮软鞋没膝短裤长筒棉袜，一派英国乡绅打扮。他会照例推开搀扶的学生，一步跃上讲台，讲一通难懂的福建客家话，这已经成了清华附中运动会的荣誉仪式。

我有一次在三项全能百米赛冲刺时，为躲跑道上照相的同学摔了出去，校长马上跑下来探问，同时扩音器里提醒不要在跑道上照相。但我那张背心前印着“清华附中”字样的撞线镜头成了绝无仅有的珍品，在四十多年后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采访时用作背景照片。

那时的学习优异者往往也是体育尖子，比如中跑冠军关天池、铅球冠军郑光召、短跑冠军刘宪英。每分钟阅读上千外文字符的尖子和在运动会上夺冠的选手在这里享受英雄般的崇拜。

那时男生的梦中情人也不是“同桌的你”，而是挺着小胸脯撞线的女生。对体育的鼓励不仅是精神的，也有物质的。那时参加运动队的学生每天早晨可以领到一瓷瓶酸奶，备战运动会时加一个肉菜。这在刚摆脱饥荒的匮乏年代简直是意外美味。后来“文革”的大字报称他们为“酸牛奶里泡出的修正主义苗子。”

海淀区和北京市的运动会则是校际竞争的战场。那时在海淀区的主要对手是隔圆明园相望的101中学。这是一所建于延安时期的干部子弟学校，天然的优越感和狂热的拼搏成了一道红色的标识，他们在跑道尽头喊哑了嗓子，流着泪为本校落后的选手加油。而清华附中则为优雅的过竿欢呼。比起101中学热衷拼搏，清华附中更追求完美。比如101中学的偶像是留着金色短发的美裔干部子弟卡玛·丽达，她三围早熟是绝对的女子铅球冠军。而清华附中的偶像是的双腿修长跳高冠军陈小悦和身材匀称女排队长刘刚。

清华附中黄金岁月的另一个标志是1965年自编自演的大型歌舞《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在整个海淀区乃至北京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称为“小《东方红》”，被当作清华附中对外形象的样板。

著名影评家和主持人方位津当时是文工团团长，她回忆：“它集歌舞、音乐、朗诵和戏剧于一体，共有100个队，二百多人，是1965年迎接二十周年校庆，完全按1964年的音乐舞蹈史诗的样子，在清华大学大礼堂，舞台两翼几百人的大合唱，全部由老师和学生自己创作。一起策划的有郑光召、段永基。自由和竞争精神聚集了学校的精英。胡兰编舞，田维煦是话剧队的，独唱周育英、胖胖的女孩子，还有杨爱仑……，高632的钟国长，染白鬓角演一个老革命。用那时典型的革命传统和阶级路线串联各场。但上百骨干中，很少有以后发起红卫兵的干部子弟，只有张承志是合唱队的，尤小梅参加舞蹈……。”

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词作曲的王雨田老师，著名作家史铁生回忆：“他是我的班主任，才华横溢。”在26年后的1992年，在西单剧场重演时，王雨田因激动过度死在鲜花丛中。他和体育老师赵晓东、美术老师吴承露造就了清华附中音体美独领北京中学风骚的华彩篇章。当年的朗诵者霍秀儿主持了这次重演，她的评价是“他（王雨田老师）这样离去也是死得其所。”

体育的三项团体冠军和文艺“小东方红”的演出代表了清华附中精英教育自由竞争全面发展的顶峰。今年夏天，我的家庭在从意大利驶往希腊的邮轮上，碰到了当年清华附中的教务主任羊涤生教授夫妇。他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的改革依然神采飞扬充满自豪。清华附中留给后世的印记不应只是犯忌的“文革”初期产生的红卫兵，也应该有不该遗忘的突破陈规的教育试验。

◇ 出身对立：左右为难的阶级路线

在附中受到清华大学自由竞争风气熏陶的同时，日益强化的阶级斗争氛围也在影响着它。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斗地主资本家到“社教”“四清”批干部，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充斥于报刊银幕。清华附中校领导大多是资产阶级和民国旧吏出身，城里中学的“四清”使他们内心震撼。从1964年开始，迎合日益左倾的政治气候，学校领导给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去参观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接着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和军训队。

后来“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者骆小海回忆：“把干部子女单独组织起来传达文件，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姨侄女王海容的两次谈话就是这样传达的。附中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军训活动，其中干部子女的比例较高。这些都为新生之气又增添了浓厚的革命色彩。”

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射击队在圆明园苍凉的田埂上立起了练习靶，使他们亲身体会到父辈掌握“枪杆子”的感觉。在这些以出身作为选择标准的队组中，正如毛主席教导毛远新的：“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父辈胜利的榜样和红色出身的自负已占据了干部子弟年轻的心灵。

高二的干部子弟杨盘、阎阳生、邝桃生、张承志组织了“红缨”小组，准备跳级参加高考，并为此办了一份既有难题解析又有时事辩论的手写小报。几乎与此同时，以高二的周舵为代表的教授子弟也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其内容更时政也更隐晦，在高知子弟中传阅。

如果说清华园的竞争教育使学生中的高知子弟和干部子弟开始分化，那么圆明园的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却人为地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加深了两个圈子的对立。

1964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校园“熊婆”事件，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一时两派的大字报针锋相对。万邦儒校长把娄某（平民子弟）由于打饭争吵对熊某（干部子弟）的动手，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竟贴满了半个大饭厅。

最后虽然学校强势出动以双方认错平息了风波，但一道“阶级出身”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

派。各班团支部的发展会也成了两派斗争的焦点。比如后来红卫兵的主要发起人王铭的入团就几经周折，几乎要上告中央。郑光召回忆：两派据理力争，互不妥协，连外班的同学都挤进我们教室来“观战”。直到最后举手表决，差一票也不行。

实际上，“校方天然地喜欢好学生并对那些娇纵散漫的干部子弟敬而远之（郑光召）”。但清华附中校领导为摆脱出身的阴影，把圆明园民族屈辱的废墟变成阶级仇恨的课堂。在圆明园搞的忆苦思甜、插秧种稻、反思原罪、入团宣誓，都具有了一种图腾膜拜的仪式感，这是其他中学所不可能有的。

校领导在对高知子弟的偏爱和对干部子弟的娇惯中左右摇摆，使两派各有所恃。实际上后来的两派对抗并不总是以观点区分左右的，1964年反对学校领导阶级路线的一派，在1966年红卫兵反对校领导时却成了坚定的“保皇派”。

◇ 万邦儒：生不逢时的教育家

1992年6月7日早晨，万邦儒因心脏病在家里悄然无声地去世。他的履历也不惊人：1928年生于四川眉山的地主家庭，1948年毕业于清华历史系，1960年出任清华附中校长共32年。这是一个常见的中学模范老校长的一生。人们把他的骨灰埋在学校一棵松树

下，也算是对“百年树人”传统理想的尊荣了。

这是因为人们没有翻动1966年这一页。在这一年前，清华附中重点大学升学率跃居榜首，高考各科平均成绩90分以上的考生占了北京市的1/4；在竞争白热化的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清华附中的一举拿到了四个组别团体冠军的三个。也就在这一年，在地处西郊一隅的清华附中发起了蔓延全国的学生运动，留给了历史一个困惑。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它的主角——不管是正面的偶像还是对立的标靶——只是万邦儒。

笔者无力也无心在本文揭开这段历史回答这个疑惑。在若干年前的一天晚上，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在深谈后对我说：“万校长啊，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教育家。”注意，不是一个行政意义上的中学校长，而是一个实践教育革新的思想家。正如万邦儒自己说的：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

原预科651班的骆小海回忆道：“校长万邦儒，四川人，一脸络腮胡子刮得铁青，人称‘卡斯德罗’，常作长篇演说，不过很享受就是了。在他的带动下，清华附中在北京异军突起。催促共青团员上跑道，食堂里多了肉菜和牛奶。在中学运动会上直到逼倒101中跃居魁首。教学上创办大学预科、自编教材、突出数理外语、强调生动活泼、每周一次电影课、参观新技术展览、参与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在文艺上开发了自己的音乐舞蹈史诗。这一系列举措带着新兴力量的创意，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奋发有为的性格。”

从以上几章中我们已经知道，1966年，万邦儒已经或接近完成了他1960年制定的“三级跳”蓝图的前两跳：头三年到1963年，第一批毕业生就要达到北京市一流学校；再三年到1966年，以预科毕业生争当全国名牌学校。“文革”的爆发，使他的第三跳成为泡影：再三年，到1969年，以奥林匹克科目竞赛成绩跻身世界名校行列。

“文革”后，他虽然又在15年的校长任上不断寻求突破，但在脱离了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清华附中，只能在行政体制中得到“模范中学校长”、“五一劳动奖章”的称号，却离教育家渐离渐远。所以说，他也是生逢其时，撞上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影评家方位津有一段描述：“万邦儒的精英教育加上他的个人魅力色彩，当时造成了一种对他的盲目崇拜。可以说，当时极左的社会基础加上万邦儒的个性也是红卫兵产生在清华附中的原因之一。‘文革’后，他依然生活在往事中，清华附中就是他的血肉和生命。失去了它，他就成了一个絮叨的老人。”

“文革”岁月中他备受摧残但顽驱不倒，或许因为批斗他的都是他精心培育的学子。1992年他卸任数月便撒手人寰，肯定是因为上苍赋予他的使命已经完结。但那个万邦儒时代留给清华附中人的印记却是终生的。他是当年清华附中教学改革绝对权威和全体师生的偶像。

他去世后不久，散布在海内外的各对立派的老三届校友汇聚在一起，为他们的老校长塑了一尊铜像，安放在新实验大楼的前厅。不知他是否理解他推崇理工的清华附中，何以产生了一个作家群：张承志、史铁生、章立凡、郑光召、陶正、周舵、骆小海、仲维光、甘铁生、胡瑞民（赵介轩）、谭甫成、宋柏林。……不知他能否听到他以往得意门生的扪心自责：“这不仅表达了我们对老校长的敬意，也表达了我们这一代含蓄的集体忏悔。”

2008年8月27日凌晨2点于清华园畔

（后记）今年5月，清华附中新任校长王殿军教授邀请老三届毕业的学者座谈，他们包括国家会计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小悦、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书记王孙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茂魁等。会上他跟我们提出了一个设想，收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原始资料，以借鉴历史启示后人。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行政领导，仅以此文抛砖引玉回报母校。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